

《纽约时报》畅销书

《商业周刊》专栏推荐

高考门槛

美国名牌大学招生纪实

THE GATEKEEPERS
INSIDE THE ADMISSIONS PROCESS
OF A PREMIER COLLEGE

[美国] 雅克·斯坦伯格 著

张久琴 刘永义 译

吕 博 审校



中国商务出版社
CHINA COMMERCE AND TRAVEL PRESS

高考门槛

——美国名牌大学招生纪实

[美国] 雅克·斯坦伯格 著
张久琴 刘永义 译
吕 博 审校



中国商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考门槛——美国名牌大学招生纪实 / (美) 斯坦伯格著;
张久琴, 刘永义译.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5. 1

(环球教育系列)

书名原文: The Gatekeepers

ISBN 7-80181-319-7

I. 美... II. ①斯... ②张... ③刘... III. 高等学
校—招生—概况—美国 IV.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5920 号

THE GATEKEEPERS: Inside the Admissions Process of
a Premier College by Jacques Steinberg

Copyright © 2002 by Jack Steinber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4
by China Commerce & Trade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出让方 Penguin Group (USA) Inc.

版权代理 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

京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4-5484

环球教育系列

高考门槛——美国名牌大学招生纪实

[美国] 雅克·斯坦伯格 著

张久琴 刘永义 译

吕博 审校

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话: 010-64269744 (编辑室)

010-64245984 (发行一部)

网址: www.cctpress.com

E-mail: cctpress@cctpress.com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73 千字

2005 年 2 月 第 1 版

2005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 7-80181-319-7

F · 750

定价: 25.00 元



序 言

美国各名牌大学的招生标准变得越来越严格，有的甚至可以说严格到了挑选教皇的程度。为什么有的申请被接受，而有的却遭到拒绝了呢？在招生委员会确定名额时，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最后的讨论会议，这几个人手里掌握着对某个申请作出接受或拒绝的理由。在最后的决定（接收、不接收或可能接收）作出之后不久，招生办通常会把讨论所用的材料送进碎纸机销毁掉。这些资料包括申请人的考试成绩、种族、加入的社团、得到的评级、运动能力、家庭关系等证明材料。在申请人接受面试的时候，这些资料就不太重要了，只能成为参考。

为了探究这一神秘的文化，我花了8个月的时间，以观察者的身份走进了位于米德尔顿的卫斯理大学招生办公室。在美国，这是一所招生选拔过程最严格的高校之一。我随后根据这段经历写了一系列的报道，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作为考察内容的一部分，当卫斯理大学的招生工作人员对众多申请（申请人数是2004届可招生人数的10倍）进行分类、评定的时候，我就站在他们身边。招生标准里所设的那些岗哨把绝大多数聚集在校门前的十几岁青年拒之门外，同时那些身在哈佛、耶鲁、斯坦福和其他十几所精英教育机构的同僚们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这一年冬季，每一所高校收到的申请表格都创了新纪录。同时每一所高校都以极其相似的方式在自己收到的申请名单中筛选着。《高考门槛——美国名牌大学招生纪实》脱胎于上文提到的系列

报道。特别讲述了招生官员拉尔夫·费格罗，和受到拉尔夫及其同事考察的那些高年级学生们的故事。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位外界人士（包括那些渴望被招入校的青年学子们）与那些真正的申请人一起，去经历一回精英私立学校的整个招生过程，感受其中的每一环节。文中提及的这些申请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活动细节都保持了原貌。

本书先从全国的学校和家庭开始讲起：那些申请者在争先参加完 SAT 测试^①并撰写完各自的大学入学论文之后，就只能耐心地和他的辅导员及家长焦急地翘首等待了。随后本书将带着读者走进招生办公室紧闭的门后，我们还将走进招生官员的家中。在招生选拔这一过程中，针对同一个学生的申请通常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意见，而且争论常常很激烈。申请人最后会收到来自卫斯理和其他高校的答复，之后就要他们自己作出决定。如果这些学子们想看看未来四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他们就要开始拜访卫斯理大学和与其构成强大竞争的各所高校了，如斯坦福、布朗、哈佛、耶鲁、康奈尔、维萨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尾声中，是各个申请者对整个折磨人神经的这段经历进行的反思，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大学校园里度过了两年美好的时光了。他们有些人进了卫斯理，有些人则没有。

由于我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走进招生过程幕后的特权，于是拉尔夫·费格罗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允许我对这里严格的招生过程中非常戏剧化的生活进行描述。这种描述方式是任何一本“指南”从没做过的。虽然卫斯理和其他高校采取了许多科学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仔细审查每年的申请材料，但他们常常还是要凭直觉作出

① 译者注：SAT（Scholastic Achievement Test）测验是由美国大约 3 900 所大学共同组成的文教组织，美国大学委员会（The College Board）委托教育测验服务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简称 ETS）定期举办的世界性测验，作为美国各大学申请入学的参考条件之一。

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很特别。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纷繁复杂的过程，只有亲眼目睹招生官员们是如何斟酌一名实际被选者的各种品质时，局外人才能领会各所院校（有时这些院校之间是相互竞争的）的偏好。同样，只有走近青年人和他们的家长身边仔细倾听，你才能体会出，为什么在 20 世纪末的今天，会有如此多的、有着不同生活背景的人挤在一起，想求得这一小批私立高校的入场券。在招生的过程中，在“美国梦”中描述的每个家庭所要追求的奖品，希望得到的顶级的个人教育都立即变得比以往更加亲切，但也更难企及了。在本书的报道中，也提到了一个让我困惑了近 20 年的问题。自从我自己开始了大学梦以来，我就在想：在其他那么多人都没进去的情况下，我怎样才能设法进去。

我记得至少从 13 岁开始，自己就想上达特茅斯大学。我不能确信当时我是不是知道达特茅斯是常春藤盟校^②（Ivy League）之一，那时我喜欢的只是它的校园。达特茅斯大学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城。那里距离我和哥哥大约 10 年前一起夏令营的地方有 25 英里远的车程。一个夏天，我和八个同寝室同学一起，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过了四天四夜，那几天都下雨。在沃尔特·惠特曼营区和达特茅斯之间有一段山脉相隔，我们试图爬过去。最后，我们到了汉诺威市，找了一个叫冰激凌机的商店避难，我们谁都不想走了。我想象着去达特茅斯大学读书，会找到在那间商店避难时的感觉。

② 译者注：Ivy League，指的是美国东部八所著名的大学院校：哈佛（1936 年）、宾夕法尼亚（1740 年）、耶鲁（1707 年）、普林斯顿（1746 年）、布朗（1764 年）、哥伦比亚（1754 年）、康奈尔（1853 年）、达特茅斯（1769 年）。这八所大学不仅历史悠久，学风相近，且均一直维持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而它们在校区内有一个共同的景观特色，就是校园建筑物均爬满了常春藤植物，因此在 1930 年代，被《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无意间命名为“常春藤盟校”，以此沿袭下来。

我高中快毕业的那年，一天早上，父母和我清晨就起床开车去汉诺威市。我们家位于东南部的马萨诸塞，到那里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到了达特茅斯学校，登上麦克纳特大堂厚厚的花岗岩石阶，参加由一名招生官员组织的总说明会。那个人就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招生官员。我坐在一个硬靠背的椅子上，地毯被精心打理得像高尔夫球场的轻击区草坪。我数了一下观众席上还有另外一百多名申请人，每一个看起来都和我一样紧张。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了全部的常春藤盟校成员，也知道了至少按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打分排名，达特茅斯大学在全国院校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我仰起头看见了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是一个表情严肃的秃头男人（他好像对我说：“你没有祷告”）。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能使我在这群人中脱颖而出，尤其在达特茅斯非常严格的校园面试过程中。但是我妈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与招生官员们的谈话一结束，就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了房间的前面。

“我们姓斯坦伯格”，她面带笑容地对那位官员说，同时意味深长地盯着他。从妈妈的语气来看，那位官员一定认为他将要接待的是位肯尼迪家族的人士，而不是一个犹太麻醉学者（我妈妈是个护士，因为一看到血就晕，故放弃了她的专业）的儿子。

当几个月后，那封装着好消息的厚厚的信封从汉诺威寄到我家的時候，我妈就确信她的自我介绍是很有个性的。完全可以肯定，她说，那位官员一定注意到这位特别的母亲对她儿子的爱是多么的深厚。对我而言，达特茅斯能看上我既让我高兴又让我迷惑。1983年，也就是我申请的那年，有近9000人为求得1000个新生名额递交了申请。那些准予入学的大部分人的SAT成绩都要比我高啊。

是我写的那篇评论让我有了如此殊荣？评论要求我对近期读到的东西进行一下反思，我就选了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在周日的《纽约时代杂志》刊登的一个专栏内容。专栏里，罗

素·贝克讲述了他的信用卡被偷，随后小偷花了上千元钱买了几张头等舱飞机票的事。贝克写到：“如今这个世界，你不是你名字所叫的那个人；你只是那个被编上号码的人。”这话一定是对我，一个被等级考试阴霾所笼罩在黑暗里的17岁的少年说的。在评论里我同样也说了很多。尽管招生委员会坚决主张我要参加所有这些考试，但他们是不是也在暗地里同意我的观点呢？

估计这会让很多人想知道我的高中是什么样的。就在我被达特茅斯接收的那年，我的一个同乡朋友却遭到了拒绝。即使她高中上的是新英格兰最好的预科学校，SAT成绩也比我好。每年她所在的学校都会向达特茅斯输送好多毕业生。我的高中仅仅是一个小城镇中的一所公立高中，而且同学中仅有一半人申请上大学。我知道的去达特茅斯上大学的最近期的一个高中校友，也在前几年毕业了。他是一位打四分卫的橄榄球明星。我却只是为一份报纸撰稿。难道达特茅斯仅仅是为了要平衡比例才录取了我，使我胜过了那些私立学校的同辈们吗？

大学招生过程几乎不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机会。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见到过招生官员，即使是一次？我的好奇心休眠了十多年，但在1999年秋却被突然叫醒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纽约时报》的一名教育新闻记者。在花了一年时间走访了纽约市各所公立学校后，我就被晋升为全国教育记者了。如今报道高等教育界的状况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报道一下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即NAACAC的年会情况。虽然这类会议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了，但会议都很隐秘，并且参会资格要求都很严格。会议吸引了许多高校招生官员和高中指导老师的到来，他们中大部分都穿着肘上打着补丁的粗花呢布的运动夹克^③。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

③ 译者注：嘴里衔着摆摆样子的空烟斗，穿着肘部打上补丁的粗花呢衣服等是常春藤名牌大学种种保守的装饰打扮之一。

会议演变成了一种许多男男女女（粗略地观察一下他们的工作，他们都在为招生非常严格的高校完成招生工作）必须到场参加的盛会。这样的聚会为招生等式两边的各位专家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此场所彼此进行率直的交流。几乎不让十几岁的学子或他们的父母们知道有这样的高层会议的召开。因此高校招生都是由 NACAC（即 KNACK - ack）在每年 9 月份开始的，这是一场壮观、华丽、人数众多并让人焦虑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但没有初始竞争者的出现）。我去参会的那一年，约有 1500 名负责招生的官员和另外 1500 名指导老师出席了会议。地点是在迪斯尼乐园。

半个世纪以来，年会的规模及其重要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高校招生程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前，精英高校的招生仍通常为某些申请人预留位置。那些人要么是因为足够幸运降生到正确的家庭，要么是因为足够的好运上了一所特别的私立或公立高中。许多情况下，高校都会为附近的一小部分生源学校的毕业生留出一定的名额，然后再同校长或负责人讨论由谁来坐这几把新生椅子。最后由大学主任把整个事情确定下来。比如哈佛，会着力招收新罕布什尔州飞利浦斯埃克塞特学院的毕业生，而耶鲁却依靠马萨诸塞州的菲利普斯安杜佛学院的生源。一个人申请三四所高校的事并不常见。同时对于多数高校来说，黑人、犹太人和妇女就不必费劲儿去试了。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大部分时间，美国人高中毕业的都相对极少，就更别提什么继续上大学了。

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帮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大门，使我们可以探看一下那些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学院的模样。这些学院的本部绝大多数都在东北地区。20 世纪 60 年代与 70 年代早期，为努力进行学院教育的多元化投资，国内最好的那些大学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活动，寻找最具潜质的黑人、西班牙人，最后是女性同胞来校学习。于是突然之间，先前那些被关在此类学院门外的孩子

们，被热情地引到了学校门前，有时他们老早就排在申请队伍的前面。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的《巴克决议》被广泛认为是允许公立及私立高校在其招生过程中把种族看成一个“附加项”。担心学生中有许多无力支付全额学费已不再有实际意义。因为各所大学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不问家境”招生政策。这种政策向学生允诺：按照学校的计算结果，学生们只需支付他们能够负担的学费即可。为帮助抵消因此产生的财务损失，尤其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高中的入学人数下降、能源价格上升的问题，各高校又开始了一场同样仔细的搜索活动，寻找那些能够支付得起全款的“顾客”，不管他们是美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

当精英大学的招生不再把继承特权作为一项主要的推荐资料后，SAT（一种智能测试，最初是哈佛仅为筛选奖学金得主而使用的）就被应征前来填补这项空白，由此给知识界的精英建设打下了基础，也使得每年有几百万的学子们争着抢着去削他们的2B铅笔。但是分析SAT成绩不能在真空环境中进行。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学生的考试成绩比那些在学术以外方面出色的学生要好，这并不总是智商的原因。因此高校的招生工作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业，促使各高校扩大其招生队伍，并修订入学标准。为确保常春藤墙内各高校备有充足的各类人才，他们都开始对某些申请人的课外活动和文化经历进行评估判断，就像对他们的学术成绩作出评估一样。大号手会突然受到像对橄榄球四分卫选手一样的恳切邀请。于是青少年们开始作出相应的反应，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因为他们认为学校希望他们这样做。

许多情况下，各高校都是依靠招生委员会做这类简历的筛选工作的，运用的是多数投票制原则。因此，分配到常春藤盟校及其他精英院校的珍贵的新生名额的过程就变得更加民主化了，主要的好处在于：被这些学校录取的学生一毕业就有机会进入美国最好的公司工作或研究生院学习。毫无疑问，那些曾把这些机会看成是他们固有特权的人会对此感到不悦，因为现在他们得去为

这些东西奋力争取，而不能再坐享其成了。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像常春藤盟校这样的精英高校，及那些以前竞争力较弱、规模较小的文科类高校，都开始遇到这种情况：学校邮箱塞满了各类申请书，有时数量达到了几年前的两倍或三倍。这不仅是因为现在高中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也不仅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的学生和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也向这类学校申请的缘故；而是因为就连那些家庭比较富裕、父母如今都达到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也越来越多地向这类学校递交他们的申请书了。虽然许多这样的暴发户家长本身曾在全国最好的公立大学受过教育，但他们在获得经济保障的同时并没有得到必要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决定要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待遇。1999 年秋 NACAC 大会前夕，由法拉、斯特劳斯及吉洛克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了《大测试：美国知识精英界秘史》一书。在书里，作者尼古拉斯·莱曼写到：

在这里您会看到美国当今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把这个国家分成了两半，一边是上过大学的人，另一边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这条分界线越来越明显了。一个人是分界线哪一边的人，如今更成了收入、地位和政治行为的标志。这条分界线要比人们做的其他界线，如地区、种族、年龄、宗教、性别、等级等，都要更明显。当人们给自己和他们孩子的生活作规划时，接受高等教育是他们考虑的主要焦点（如果能接受高教体系中的精英教育，就更是他们渴望的重中之重了）。

家长和孩子们都发现如今追求高等教育梦想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为了帮助他们实现梦想，一种小作坊工业开始兴起。斯坦·卡普兰的备考教程（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引起大家的兴趣，这套课程据说能针对 SAT 提供训练指导。它与一般的考试程序不同，类似于一种 IQ 智能测试，在 80 年代受到广泛欢

迎，以致出现了好几家竞争者，其中《普林斯顿复习》最有名。像那些收入颇丰的心理学者一样，高校指导老师也开始挂起营业招牌，向公立高中的中等阶层学子们提供策略服务。而以前，这种服务只被那些精英私立学校中的学子们享有。同时，盈利性质的高校指南组稿商也应运而生，他们主要提供全国顶级高校的排名和详细的照片资料。还有些书声称能告诉人们如何决定性的取得成功——进入高校（其中至少有一本叫《入学》）。很显然金钱使一些申请人具有一种隐性优势，而这对于学校里初出茅庐的知识界精英们来说，是有危害的。所以各高校开始调整招生程序，按照考试成绩和级别提高入学门槛——他们希望那些有财力的学子们可以越过。不久评论家们就发现出现了一种双重标准，他们说这同样对校内的知识界精英们有危害。如果有一个申请人，经济穷困，而且学术成绩可能还稍稍低于一个家境较好的申请人，多数情况下，经济条件差的会被认为是两个人中更合适的新生人选。

同时，入学典礼的召开也越来越早了。人们知道各高校都希望申请人在高中时，根据掌握程度多修一些大学水平的跳级课程，预先选学的这些课程最好是针对自己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在初中时就要开始学一些高中水平的课程，实际上已有很多学生这么干了。那个时候，更多的高校也开始鼓励那些对其首选目标很确信的申请学子们，在高中快毕业的那个秋天，就早点向高校递交申请书。申请书中还时常附有一个应对该高校12月份（而不是传统的7月份的招生时间）招生的志愿。像高校关注SAT成绩和AP课程一样，对提前定志愿的日益强调，又开始进一步地蚕食学子们的高中生活了。到20世纪90年代末，包括卫斯理在内的一些高校，在绝大多数学生开始申请前就已经把下一年新生名单的40%定下来了。那些还上六年级的年轻孩子们抱怨说，准备上大学的压力太大，让人无法忍受。

随着11月份提前志愿的增多，一直在9月召开的NACAC大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1999年秋我去了奥兰多的天鹅海豚度假胜地，那个时候我终于感觉到叩开了招生办公室的门。在那间人工天窗照明，装饰着巨型清淡优美的花的房间里，近450所高校的代表们肩并肩地站在一排排长长的桌子（好像没个尽头）后面。高中指导老师们（有的来自公立院校，有的来自私立院校，还有的是家庭个人雇用的）像一艘艘试图靠港的、慢悠悠的驳船（但常常是被浪潮冲到一旁），在这些代表面前不停地晃悠。因为所有高校都是按字母排序的，所以没有哪所大学拥有特别的优势。盖在可折叠长方形桌上的棉布或尼龙标语帘，每一块长度都不超过6英尺。

事实上，唯一例外的是哈佛：它的展位是别人的两个长。这也就能更好的接待那些一直围在比尔·菲茨西蒙斯（他长期担任哈佛的招生主任）身边的群众。他的衣着看起来很得体：熨烫过的斜纹棉布裤，蓝色运动夹克，浆洗过的白衬衫（领尖扣没有扣上）。他的建议极受欢迎，以致于他得长期服用止咳药片来保证嗓音。菲茨西蒙斯迷们排队一直排到了隔壁的走廊里，那里有一位不怎么显眼的竞争者——加利福尼亚州克莱门特的哈佛莫德学院。

这些指导老师们一手挥舞着钢笔，另一只手拿着一堆商务名片，向哈佛、普林斯顿、达特茅斯、斯坦福、耶鲁及其他高校的展位挤去。一旦挤到展位桌前，他们就在那些卡片背面狂写下他们中意的高年级学生的名字，然后塞到招生官员的手中。这些指导老师认为，这么早就把申请人的名字放到招生官员面前，今后会因此而受益。反过来呢，那些更多只有区域影响的学院（比如哈佛莫德学院）的代表们也希望，通过参加NACAC，他们可以得到一个机会，向那些来自全国其他地方的有影响的指导老师的耳朵里吹吹风，念叨念叨他们自己学院的名字。

我只是想强调一下，招生过程已经变成了一项多么大的商业

活动：几百家公司代表也在紧邻的空地支起了同样大小的摊子，向各所高中（往大了说，就是向学生们）和高校推销他们的产品。管理 SAT 考试的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College Board）派出 29 名统计学家和其他员工参加了本次大会，因为每次都有一小部分文科类高校在质疑这种考试的价值（而且有这种质疑的学校越来越多了），有的学院甚至不再把这种考试作为入学要求了。卡普兰（有限）公司，是与 SAT 一同成长起来的企业，目前由华盛顿邮政公司所拥有，向 NACAC 派出了 10 名代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它对全国顶级高校的排名已进行了扩展，把研究生院和医学院也包括在内了），此次派出了 13 名研究员和销售人员。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公然出现的商业行为并不一定受欢迎。加利福尼亚州波莫纳学院的副校长，并长期兼招生委主任的布鲁斯·波奇，在此次的会员大会致词中说道：“我对此次大会中 NACAC 的行为，感到悲伤。因为在我和其他许多人眼里，大会看来正要改变其专业性质，只热衷于那种为期四天的广告宣传活动。”

我手里抓着我的编辑所列的各知名主任的名单表，费劲地穿过人群。菲茨西蒙斯，从 1972 年就去哈佛工作，当然是名单中的一员了。比尔·希斯，在贝茨学院（缅因州路易丝顿市的一所较小的文科类学校，距离哈佛园以北 140 英里）工作的年头差不多和菲茨西蒙斯一样多，当然也列入了名单。在我见到希斯（他现在已经是贝茨学院的副校长）和怀利·米切尔（继希斯之后任招生委主任）后不久，他们就向我提了个建议：在他们选拔 2004 届新生过程中，我可以花 9 个月的时间，作为一名贝茨招生办公室的首席观众亲历现场，不知我对此是否感兴趣？

这是一个很诱人的提议，不仅仅是因为时间问题。前一年春天，我的编辑伊桑·布朗纳就已经在《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说，在几十所招生严格的高校中，2003 级的招生选拔竞争非常激烈；而即将开始的这一学年已经有迹象表明要打破已有的多项纪录。

就像婚礼上香槟酒沿着金字塔状的玻璃杯一级一级流下来的样子，申请常春藤盟校没有成功的学子们又大量地涌向下一级学校，像贝茨学院和近旁的鲍登和科尔比学院，还有米德尔伯里、威廉士、艾姆赫斯特和斯沃斯莫尔。它们的下一级，是一些曾被成绩好的学生除名于安全有保障的好学校之外的高校（有纽约州北部的斯基德摩尔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州理海谷的美仑堡学院），他们也是受益者。因为他们发现，现在他们也可以对一些出身重点高中的学生说不了。学子们为了给自己的赌注做一下套期保值，只要他们的父母和所在的高中同意，他们就会向十几所或者更多高校发出申请书，这就进一步阻塞了传递通道。

贝茨学院是根据一种经过长期检验的模型来作自己的招生决定的。它的招生标准类似于其他五十多所高校长期遵守的准则（这些高校每年都是拒绝的学生要比接受的学生多）。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贝茨学院不需要申请人递交 SAT 成绩，而在精英高校中这样做的学校还相对较少。虽然这样做的意图的确值得观察考证，但贝茨学院的各项政策太反常，和大多数高中生在申请好大学时经历的事情没什么相关性。所以我和我的编辑决定还是不接受贝茨学院的邀请。

但是，想实地观察实际招生工作的白日梦已经做了太长时间了，我不能在拒绝了贝茨学院的邀请后就不再去想它。所以我开始寻找另一所精英大学，一所可以让我旁听其招生过程的精英高校。当然我最后的搜索标准同那些招生官员和申请人自己的标准一样，是很具有个人主观性的。我搜索的目标学校要在距离曼哈顿岛两小时的车程范围内，这样我就仍然可以为《纽约时报》做其他地区的教育报道工作。虽然我要访问常春藤盟校中每一所高校的招生官员，但我希望采访的是其他人，而不是他们。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些招生官员是顶着巨大压力的，他们所在的高校几乎是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但高校本身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来扩充其招生人员的队伍，去应对这种突然到来的火爆场面。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招生官员们是怎样作出选择的。我还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抓住那些总是让人很难捉摸的“优点”的。那年秋天，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及其他一些州的公立学院取消了对几代人都有重要影响的、有关反歧视运动的规定。我接触了十几所大学，他们大部分都拒绝了这种请求，因为担心我的出现会危及招生过程的安全。可以理解，他们关心的是要有一种机制，一种关系到他们要怎样作出非常敏感决定的机制，一种与很多人（可能是理事人员，或者是有钱人）利益相关的机制。如果有人一定不同意一项特殊招生，那么结果很可能是学校的捐款要受损失了。虽然还有其他很多大学可供我选择，但有好几个指导老师警告我说，那些高校的招生主任只会给我看经过“清洁”处理的招生程序。

那就剩卫斯理可供选择了。卫斯理是由卫理公会派大臣和康涅狄格一所小镇上的几个神父在1831年共同建立的。如果在橄榄球方面的出色表现不一定能使卫斯理很出名的话，很早以前该校就开始享有文科教育权威学校的巨大声誉了。虽然卫斯理距离纽海芬市西南地区仅有27英里，但卫斯理卓越的声誉使得几乎没有其他高校可以与之相比。

卫斯理尤其以它的优秀的写作课和文学课而闻名。该校毕业的学生有：塞巴斯蒂安·容格，一位人类学家，后来写了《完美风暴》一书；罗宾·库克，一位化学家，是畅销书《昏迷》的作者，并写了其他几本有关医学神秘故事的书，也很受欢迎；亚历克斯·科特沃夫斯基，著有《这里没有孩子》一书；及悬念小说家罗伯特·勒德姆。写《感恩的逝者》的抒情诗人约翰·佩里巴洛也去过那里。卫斯理还有一个有名的电影研究系，该系收藏着马丁·斯柯席斯、弗兰克·卡普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其他人的文稿。近几年来，卫斯理的教师队伍收入了电钢琴演奏家杰伊·霍格德（他也是该校毕业生），爵士乐萨克斯管吹奏家安东尼·布拉克斯顿，环保作家安妮·迪拉德，以及菲利

斯·罗斯——《阅读普鲁斯特家族》一书的传记作家。

同时，卫斯理从20世纪60年代存留下来的反传统文化的风气，也一直保存得比较完整。也许只有在伯克利市的加州大学里，学生们才可以努力保有嬉皮风气。实际上，在卫斯理，“积极行动”^④（affirmative action）的定义非常宽泛，其中还包括允许学生有保守倾向等。一位前招生官员对我说：“如果学校里有一些反对人为堕胎的人士就好了。”

卫斯理没有成为精英中的精英的原因之一是其校园问题，这至少是有些学子们所关心的。坐落在绵亘起伏的山坡上，虽然可以看到康涅狄格河慑人心魄的美景，但卫斯理既没有大门，也没有中心校区。当那些学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从米德尔顿的贫困市区赶路上山的时候，他们几乎是爬着到达卫斯理的。虽然有林肯纪念馆和原宾夕法尼亚州车站的建筑师们参与该校部分建筑的设计，但全部的惊世之笔却因为整体形象而受到了减损。在卫斯理，在一座中世纪式的城堡（即老体育馆）的对面，就矗立着一座设计像史前巨石柱那样的现代的混凝土艺术中心。由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缺少资金（部分原因是卫斯理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有毕业生捐款的竞赛活动），有些工程不得不停工。校园里的许多赤褐色砂石建筑的表面上都积了一层灰，这些建筑都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开始建造的，石料从附近的采石场运来。校园的某些地方看起来很需要洗个澡了。

但是卫斯理显然符合热门学校的条件，其招生工作者超负荷的工作就是明证。在1985—1986学年期间，莫林·多德（当时负责《纽约时报》首都地区的报道工作）因为要撰写几篇文章曾特意拜访了卫斯理，那时候该校就收到了4900人的申请，1990年的数字为4400人。以后逐年增加，申请2004届入学机

④ 译者注：美国鼓励雇佣少数民族成员、妇女、残疾人等的赞助性积极行动。